

# 古文译介之“义法”再现

——谢译《左忠毅公逸事》之得失论

张枝新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00)

**摘要:** 方苞的散文名作《左忠毅公逸事》, 是其“义法”说的典范之作, 因此, 对原文“义法”的梳理与掌握, 是翻译《左忠毅公逸事》的必要环节。谢百魁对《左忠毅公逸事》的英译, 紧扣原文讲究“义法”的特色, 用词简洁准确、句章连贯、内容前后相应, 但同时因囿于对原文“义法”的再现, 谢译存在着些许的疏漏与遗憾, 这些对于我国古文译介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 古文译介; “义法”; 《左忠毅公逸事》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310(2017)05-0084-04

## 引言

我国清初文坛重道轻文, 推崇遵循孔孟程朱之道, 在此背景下, 桐城派散文鼻祖方苞却把文学创作的重心转向审美, 否定了以“道”作为文章创作的最高要求<sup>[1]</sup>, 并从文学本体出发, 提出了“集古今文论之大成”<sup>[2]488</sup>的“义法”之说。“义法”源自《易经》, “义”即“言有物”, “法”即“言有序”, “义”与“法”经纬交织,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 二者密不可分, “然后为成体之文”<sup>[3]29</sup>。换言之, 在方苞看来, “义”指的是文学作品的题旨与内容, “法”指文学作品的逻辑结构与布局形式, 它们缺一不可, 二者兼备, 才能构成有机统一

的文章整体。方苞不仅是“义法”说的理论倡导者, 也是“义法”说的践行者, 其散文名作《左忠毅公逸事》即为“义法”的典范之作。

谢百魁先生的译著《中国历代散文一百篇(汉英对照)》, 就选择了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译介给英语读者。本文拟从方苞的“义法”理论出发, 立足于对《左忠毅公逸事》“义法”的梳理与分析, 探讨原文“义法”在谢译中如何得以再现, 以及谢译为求“义法”导致的不当与疏漏之处, 从而为我国古文译介工作提供启示意义与借鉴价值。

## 一、《左忠毅公逸事》之“义法”梳理

“义”是“法”的根据, “法”是“义”的表

收稿日期: 2017-02-20

基金项目: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家级特色专业项目(TS12154);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桐城派散文英译研究”(AHSKQ2016D118)。

作者简介: 张枝新(1982-), 女, 汉族, 安徽潜山人,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现,“法随义变,亦从义出”<sup>[2]490</sup>。《左忠毅公逸事》的“义”,如文题所示,是以左光斗的忠毅为核心。该文中,方苞精心选材,从不同角度刻画了左光斗这一人物的“忠毅”形象。文章首先描述了左光斗京畿视学时,偶识史可法之才,于细微之处,尽显左光斗为国惜才之心。随后,又讲述了左光斗因被奸佞陷害而身陷囹圄,史可法想方设法入狱探望左光斗,却遭到左光斗的怒斥,反映出左光斗忧国思民、爱护人才的高尚品格。此外,方苞还通过侧面烘托的手法,描述了继承左光斗之志的史可法如何勤国治兵,以证左光斗慧眼得才。而史可法的“下恐愧吾师也”,更是体现了恩师左光斗对其影响之深远。可见,《左忠毅公逸事》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充分体现了方苞作文“言有物”的特点。

方苞的“义法”,既可看做两个分立的单词,又可作为一个连缀的骈词<sup>[2]488</sup>，“义”偏向“法”，着重于“法”，体现了方苞“义法”说对作品题材、体制、结构、语言以及审美意蕴等文章艺术形式的强调<sup>[4]</sup>。关于“法”，方苞曾指出，记事之文，应该“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文章“前后相应”，行文布局“变化随宜，不主一道”<sup>[3]32</sup>。

《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处处彰显出方苞对行文有“法”的重视。从文章标题就可看出作者的用心，选用左光斗的“忠毅”谥号为题，与正文里左光斗的忠毅之举形成呼应。而且，文章先正面描写左光斗，后又通过史可法侧面烘托左光斗的写作手法，也可看出作者在材料组织上的井然有序与独具匠心。

由于方苞对“义法”的看重，其“雅洁”理念也随之衍生。文章若要做到“雅洁”，首先，“辞无芜累”“明于体要”，即语言文字要简洁精练；其次，“所载之事不杂”，对表达内容得有所取舍。这样一来，文章“气体为最洁耳”<sup>[3]28</sup>。所以，讲究“义法”的文章，必定“雅洁”，某种意义上，“雅洁”可视为衡量“义法”的标准<sup>[2]491</sup>。

《左忠毅公逸事》行文十分“雅洁”，未浪费分毫笔墨，文章脉络清晰，前呼后应渗透于全文的字里行间。如文章首句中“视学京畿”四字，并非泛泛之言，它不仅交待左光斗当时的身份地位，而且为下文的“及试”作了铺垫，使得“面署第一”不至于来得突兀和莫名其妙。而“一日风雪严寒”，也非对自然气候的简单描写：一方面，它表明左光斗在恶劣天气下依然勤勉学政；另一方面，

只有在这种“严寒”之时，才会有后文中左光斗“解貂覆生”，临去又帮史可法“为掩护”的一系列动作，从而表现出左光斗对人才的赏识与爱惜。若没有前文的“叩之寺僧”，问清姓名，当考官叫到史可法的名字时，左光斗也不会“瞿然注视”，并“面署第一”。甚至，连文末提到“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也非无缘由的随意之笔，它既暗示文中所记逸事确凿可信，也表明左光斗的事迹为世人所传颂。

由此可见，《左忠毅公逸事》笔触简练、描写入微，前后相应、布局严谨，充分体现了方苞行文讲究“义法”的特点。

## 二、谢译“义法”之再现

译者从事古文翻译，首先需要对原文进行文体分析，从而准确地掌握原文的结构与内容，正如刘宓庆指出，译者的任务不仅限于传达原意，而应对原文进行反复阅读、钻研，掌握原文的总体风貌，如用词倾向、句式特点、修饰手段、表意方式、词语情态以及句段安排等方面的问题，然后运用翻译技能处理原文，使译文尽可能适应原文的总体风貌<sup>[5]457</sup>。

由于散文没有优美的韵律节奏，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若想唤起读者的审美共鸣，要靠遣词造句<sup>[6]</sup>。以文中人物姓名处理为例，就能看出谢译在遣词造句方面相当用心。对于左光斗，一方面，译者直接称呼他为“Zuo Zhongyi Esquire”和“His Excellency”<sup>[7]493</sup>。“Esquire”一般用于男子的姓名后以表示尊敬，“Excellency”则是对高级官员的一种尊称。这样借助称呼，译者突出了左光斗身居要职的地位与身份。另一方面，译者使用“his kind patron”<sup>[7]493</sup>与“his protégé”<sup>[7]495</sup>，分别指代左光斗与史可法，从而直接点明左光斗与史可法二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既呼应了前文左光斗对史可法的提携一事，也为后文史可法敬重左光斗的种种表现作了铺垫。

不同于一般的古文外译，译者往往在译文中添加许多解释性翻译。谢译最大的亮点，就是选词比较精简恰当，译文不会让读者觉得有丝毫的啰嗦与累赘，这与方苞行文“雅洁”的主张十分吻合。例如，狱中左光斗用地上刑械，撵走前来探望他的史可法，对于“刑械”一词，译者并未用直译其表层的笼统涵义，而是根据文中语境，将这一意象具体化，选用“fettters”<sup>[7]495</sup>一词，准确地交代了此处

到底是何种刑械工具。史可法看望狱中的左光斗后,感叹“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时,译者对“肺肝”也未采取逐词对译的方式,而灵活地换成用“heart”<sup>[7]495</sup>来传达,既简洁又恰当。

此外,如同方苞对文章“前后相应”的重视一样,谢译也很注重句间的逻辑性与衔接性,以帮助译文读者梳理前后句间的语义关系。例如,“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谢译为“He himself sat on alert outside the tent, and had ten robust soldiers squat in pairs against each other for the same purpose. But the latter arrangement was made in shifts”<sup>[7]495</sup>。显然,此处“for the same purpose”和“the latter arrangement”都是译者自行补充的解释性说明。

“for the same purpose”将史可法为何让士兵“蹲踞而背倚之”的动机,向英语读者作了清楚的交代,而“the latter arrangement”则强调只有士兵们才能“漏鼓移则番代”,与不能被替换休息的将领史可法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尤其连词“But”的增添,更突出了史可法身先士卒的光辉形象。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文章结构形式上的连贯与衔接,方便译文读者理清原文内容上的呼应关系,而且彰显出了原文“义法”的严谨性。

### 三、谢译“义法”之不足

通过谢译《左忠毅公逸事》,能看出译者对原文“义法”的关注与凸显,但正因译者过于追求与原文近似的“雅洁”,注重语言的简约,使得译文中有些地方的处理值得商榷。如将“崇祯末”直译成“at the end of the Chongzhen period”<sup>[7]495</sup>,且未添加任何注解。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朝代的西方读者来说,如此简单的处理,无法让他们获得充足的背景信息,无疑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此处,译者既可以采用直译加注的方式,在交代事件发生时间的同时,让译文读者了解一些中国历史背景知识,也可以将有中国特色的朝代纪年方式,变换为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方式,从而让英语读者十分便利地获悉事件发生的时间。

文章内容的前后相应,谢译比较看重,但在语法层面上,谢译却有部分相邻句的主语变换频繁,造成句间连贯性不够。如在“庀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谢译为:“In the corridor he saw that a young man, leaning on a table, was sound asleep. He had just finished the draft of his essay.”<sup>[7]493</sup>译文中

出现的两个人称代词“he”,指代的显然并非同一人,第一个he指的是左光斗,第二个he指的却是史可法。而在翻译紧随其后的“叩之寺僧”时,谢译的主语又一次发生了变换:“Upon inquiry a monk told him……”<sup>[7]493</sup>,即主语从左光斗切换到寺僧。一般来说,相邻句子的主语不宜变换如此频繁,否则会使句间衔接显得不够紧凑,语义上也缺乏连贯性,鉴于此,翻译时不若一直以左光斗为这些句子的主语,这样既吻合左光斗是文中核心人物的主角地位,又能使这些句子保持一致性,显得行文逻辑严密、丝丝相扣。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主体性,但由于译者个人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有些翻译处理并不一定符合原作的初衷,甚至很可能因曲解原文导致误译,向译文读者传达了一些错误信息。谢译因拘泥于原文表层涵义的理解,存在个别翻译欠妥的现象。如左光斗入狱后,史可法想尽办法,乔装打扮到狱中见他一面,却被左光斗呵斥为“庸奴”。谢译将“庸奴”译为“You slave”<sup>[7]495</sup>,直译了“奴”一词的基本含义,曲解了它的语境涵义。此处的“庸奴”,并非一般性的辱骂词汇,而是左光斗对门生史可法不顾国事、置身险境的莽撞行为忧极至怒的反应。谢译如此措辞,无疑会让人困惑不解:它一方面错误地暗示了史可法与左光斗之间存在主仆关系;另一方面也颠覆性地破坏了原文中左光斗的担忧语气,代之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轻视口吻。

译者从事古文翻译时,不能只专注于原文主旨与风格的整体译介,忽视文字细微之处的准确传达,从而造成译文的疏漏与瑕疵。例如,古汉语中有些词汇虽保留至今,但词义已经迥然不同,译者如果不了解这种差异,翻译时就很可能望文生义,导致误译。谢译中也存在类似现象,译者将原意为五十两银子的“五十金”,错译为“fifty taels of gold”<sup>[7]493</sup>,又将本意指左光斗女婿的“左公甥”,错译为“Zuo's nephew”<sup>[7]497</sup>。因此,理解古文原文时,译者不能粗心大意,不能基于现代思维去想当然地理解古文,而应对原文的一字一句都要进行谨慎的考证,只有这样,才能将原文理解透彻,生成忠实准确的译文。

### 结语

方苞的“义法”说,是对我国古文创作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与之以前的各种文派主张相比,是



“兼收众美”的集大成者<sup>[8][120]</sup>。《左忠毅公逸事》行文十分讲究“义法”，如何传译这种“义法”，使之不遗失在跨语言、跨文化的鸿沟之中，这就要求译者将“义法”的标准同样运用到翻译中，对译文进行严密、谨慎的处理。谢译句章连贯，内容前呼后应，选词简洁准确，谋求原文“义法”再现的痕迹十分明显，译文也比较接近原文的风格，体现了译者对原文主旨和精髓的理解与掌握。但正因对原文“雅洁”文风的追求，谢译用词过于简约，有一些文化负载词的内涵意义并未充分传达出来，文化背景知识也显得不足，再加上时代变迁，对原文个别词汇的意义理解上有偏离，造成译文存有些许的疏漏与遗憾，这些都值得后来者引以为鉴。

参考文献：

- [1] 王荣. 桐城派文章学视野下严复译著的新解读[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 (1): 81-85.
- [2]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 [3] 方苞. 方望溪全集[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91.
- [4] 张伟. 形式的超越——方苞“义法”说的审美阐释[J]. 社科纵横, 2010 (1): 85-88.
- [5] 刘宓庆. 文体与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 [6] 陈晓兰. 从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看唐宋山水散文的发展[J].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4 (3): 66-68.
- [7] 谢百魁. 译. 中国历代散文一百篇(汉英对照)[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
- [8] 周中明. 桐城派研究[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 The Reproduction of “Yi Fa”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Translation: On Xie Baikui’s *An Incident from the Life of Zuo Zhongyi Esquire*

ZHANG Zhi-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00, China)

**Abstract:** Fang Bao’s prose *Zuo Zhong Yi Gong Yi Shi* is a typical masterpiece revealing his view of “Yi Fa” (a theory on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literary works). Therefore, to translate the prose into another language, it is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to analyze and comprehend “Yi Fa” at first. Xie Baikui’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rose, *An Incident from the Life of Zuo Zhongyi Esquire*, centering around the original’s emphasis on “Yi Fa”, features concise diction, coherent sentences, echoing content and so on. However, due to the pursuit of reproducing the original’s “Yi Fa” in the translated text, there are negligence and mistakes in Xie’s translation. All of these findings can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translation.

**Key words:** the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translation; “Yi Fa”; *An Incident from the Life of Zuo Zhongyi Esquire*

